

金庸笔下的故事，渗透了我们的光阴，也会长久地流传下去

唯有侠者留其名

李汇川

金庸去世当夜，湖北襄阳的古城墙上，亮起了繁星般的点点烛火，寄托着哀思与悼念。襄阳一带在古时是军事要地，发生过几场著名的战役，例如汉末三国时期关羽北伐曹操的襄樊之战、明末农民起义时张献忠突袭襄阳城一战等等。其中战争过程最为漫长，争夺最为激烈的，要数宋元襄樊战役。这一场断断续续将近40年的攻守战，南宋军队最终失败，蒙古攻克襄阳。金庸以这场战争为历史背景，塑造出的郭靖这一人物形象，被

很多人认为是他笔下最具代表性的“大侠”。在《射雕英雄传》里作为男主角的郭靖，少年快马，游历四方，学成一身本领，也收获了与黄蓉终生不渝的爱情。到了《神雕侠侣》中，人至中年的郭靖不再是主角，但他的“大侠”形象是在这部作品中真正被树立起来的——由于他数十年间驻守襄阳，率领军民抵抗外敌，保卫家国。“为国为民，侠之大者”八个字，也紧密地和金庸的武侠小说联系在一起。

在《射雕英雄传》的结尾，金庸告辞意犹未尽的读者们：“郭靖、黄蓉等事迹在《神雕侠侣》中续有叙述。”而到了《神雕侠侣》的篇末，类似的一行文字中，不再有这对伉俪的名字。后来呢？郭靖和黄蓉后来怎么样了？年少时，急切地翻开《倚天屠龙记》，读到郭襄推荐张君宝去襄阳投奔郭靖与黄蓉时，感到片刻的安定。然而，张君宝终究没有往襄阳去，在小说描述他潜心习武的短短几段文字中，故事里的时光在须臾间遽然流

逝，少年张君宝成了90岁的张三丰，而宋朝，已灭亡50多年了。至二十七章，出现了这样一句话：“襄阳城破之日，郭大侠夫妇与郭公破虏同时殉难。”小说中的大侠与英雄，虽能自绝境处逢生，扶大厦之将倾，但他们不能抵抗呼啸而来又滚滚而去的历史洪流，也无法逃脱“生老病死，时至则行”的自然规律。大侠与英雄，终将逝去，而讲述大侠与英雄的故事的人，同样如此。



梁羽生写武侠小说较金庸更早，他认为好的武侠小说，应该着重提升在精神与思想方面的境界。金庸的武侠小说，在梁羽生的理念基础上，对“侠”这个当时看来既空泛又驳杂的概念，进行了他自己的阐释。“为国为民，侠之大者”，是郭靖对杨过的教诲，也是金庸借郭靖之口，对“大侠”一词的重新定义。

右图为根据《射雕英雄传》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剧照，下图为根据《天龙八部》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剧照

在金庸笔下，之前往往被认为是游离于世俗规范之外的侠客，与家国百姓紧密联系在一起。这是对“侠”的社会意义的提升。

关于金庸，学者陈平原有一句话很出名：“大作家的出现，可以提升一个文学类型的品格，这点早被中外文学史所证实。”此语虽指金庸与武侠小说而言，却说得谨慎，意在探讨，并非定论。但20年来，这句话不断被学者与评论家所援引使用，语意发生了一些变化，“金庸提升了武侠小说的整体品格”成了被广泛认可的“判词”。原话的“被误读”，恰恰证明了金庸武侠小说的巨大影响力。

武侠小说，主要写的是侠客们的故事。“侠”的概念比较丰富，随着历史的发展，也在不断变化着。作家梁羽生在上世纪70年代的一次演讲中说：“侠就是正义的行为。”而司马迁在《史记·游侠列传》里提到游侠时，写的却是：“其行虽不轨于正义。”“侠”在演进，不同的时代对“正义”的理解阐释也会有偏差，这注定了“侠”的概念是复杂性的。

金庸的武侠小说，特别是我们通常说的“射雕三部曲”（《射雕英雄传》《神雕侠侣》《倚天屠龙记》），在梁羽生的理念基础上，对“侠”这个当时看来既空泛又驳杂的概念，进行了他自己的阐释。“为国为民，侠之大者”，出现在《神雕侠侣》一书中，这八个字在情节上，是郭靖对杨过的谆谆教诲，在更深的层面上，既是金庸对郭靖这一人物所作的“判词”，也是他借郭靖之口，对“大侠”一词的重新定义。于是在金庸笔下，之前往往被认为是游离于社会体制与世俗规范之外的侠客，与家国百姓紧密联系在一起。这是对“侠”的社会意义的提升。

武侠小说，主要写的是侠客们的故事。“侠”的概念比较丰富，随着历史的发展，也在不断变化着。作家梁羽生在上世纪70年代的一次演讲中说：“侠就是正义的行为。”而司马迁在《史记·游侠列传》里提到游侠时，写的却是：“其行虽不轨于正义。”“侠”在演进，不同的时代对“正义”的理解阐释也会有偏差，这注定了“侠”的概念是复杂性的。

金庸本人充满是非的真实人生离我们很远，但他笔下的故事渗透了我们的光阴。讲故事的人逝去了，但故事会留下来。

“大侠”并非“侠”的全部。这一点金庸在《笑傲江湖》的后记中写得清楚：“对于郭靖那样舍身赴难，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大侠，在道德上当有更大的肯定。令狐冲不是大侠，是陶潜那样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的隐士。……‘笑傲江湖’的自由自在，是令狐冲这类人物所追求的目标。”

订版的出版，都是近40年前的事了。“金庸”早已悬笔拂衣，归去良久。他在文学领域的成就、对武侠小说发展的推动、对数代人的阅读生活的影响等，这几十年来我们已谈得很多了。但今年此时，仍有不计其数的人在媒体和社交网络平台，书写着对金庸的评说与追忆。可以说，每个爱读金庸小说的读者，都有自己关于金庸的回忆。我的记忆里，从本科到博士生，每到一个新的环境，初识新的朋友，大家一旦聊到金庸，往往顿生相见恨晚之感，很快便能熟络起来。

33年前古龙逝世时，倪匡为他拟了一副“小李飞刀成绝响，人间不见楚留香”的挽联，至今仍被许多人念念不忘。其实倪匡写错了，小李飞刀和楚留香依然在，一代又一代的读者正是通过他们，可以重访古龙，去探寻他的思想，了解他的人生。对金庸来说，也是如此。大侠与英雄，都逝去了，讲述大侠与英雄的故事的人，也逝去了。但故事会永远留下来。（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在读博士生）

也许可以说，郭靖的“兼济天下”与令狐冲的“独善其身”，是金庸自己人生的两个面向。他创办《明报》时“铁肩担道义”，在《明报》事业到达高峰时，他急流勇退。进退之间，或许达不到他笔下独孤求败那“不滞于物”的境界，但确实有着面对人生抉择时从容不迫的气度。

查良镛94年的传奇一生，帷幕落下。“金庸”这个笔名起的随意，是他从名字里顺手拆分，署到报纸专栏上的。年轻的查良镛未必能想到，这“填天窗”的故事连他一笔就写足了15部长篇小说。在绝大多数人的认知中，金庸的盛名系于15部武侠小说，但仔细回想，其实这15部小说，即使是修

几年前的一次学术会议上，我初识著名学者严家炎先生。先生那时年逾八十，我在他面前很拘谨，忽然想到严先生是喜欢读金庸的，于是告诉他，我也是个“金庸迷”，他的《金庸小说论稿》我翻来覆去读过很多遍。严先生一下子来了兴致，说：“金庸的小说，写得很好啊！”一时间，我一个晚辈和前辈之间只觉相见恨晚，那日话别后，我感慨金庸作品的“魔力”，其在读者间引发的共鸣，可消弭年岁、

辈份等诸多差异，在短暂的瞬间，拉近两个人的距离。金庸过世，为何会有如此多的人表达悲意？我想，文学是一种奇妙的形式，写作者与读者无论在时空上如何遥远，都会因同一部作品而产生心灵的共鸣。对倾心阅读过他的作品，拥有那些或壮阔或琐碎的记忆的我们来说，金庸这个名字，就像儿时为你认真讲述故事的长辈，他本人充满是非的真实人生离我们很远，但他笔下的故事渗透了我们的光阴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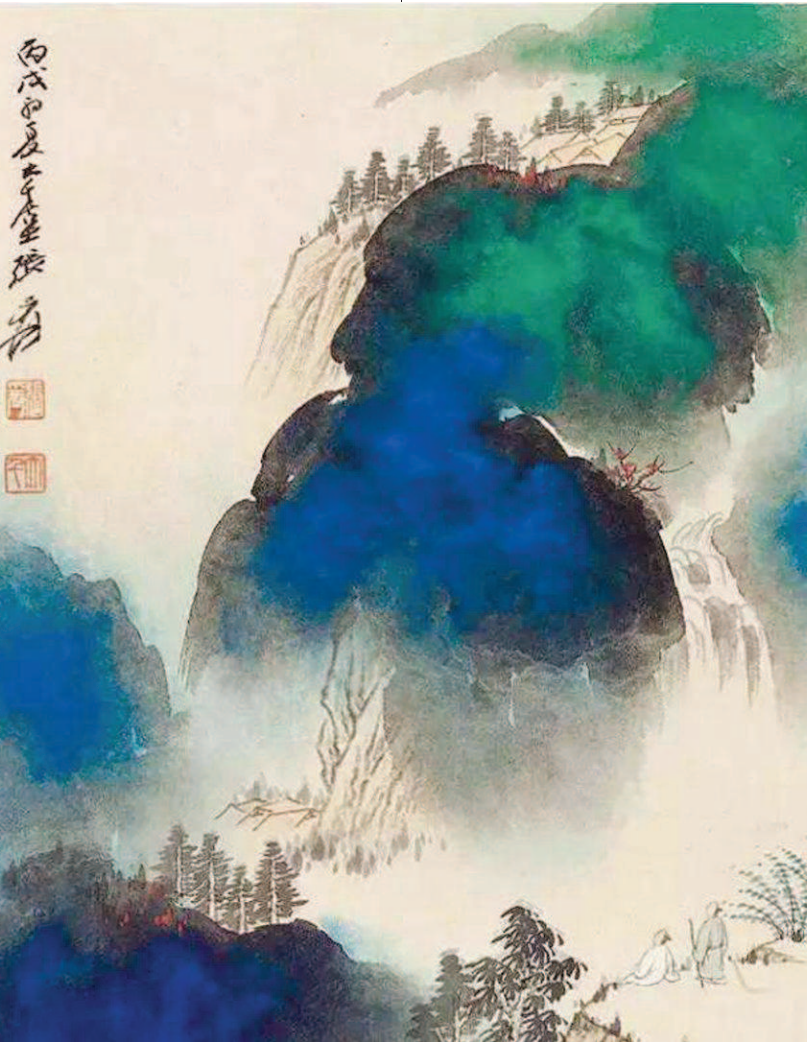
以科学家的身份留名青史的张衡，在文学史中也有一席之地——

科学家张衡如何定义了早期七言诗

萧牧之

张衡的一首《四愁诗》，被视为早期文人七言诗的代表作，文字明净隽永，一唱三叹。在盛行模拟的六朝文坛，《四愁诗》作为前朝珠玉，让后辈文人深感压力，传下来的拟作只有两首。两首《拟四愁诗》都是西晋作品，以此作为切入点，可以窥见西晋文学的一个侧面，也能进一步确认张衡“科学家写诗”的高妙。

下图为张大千青绿山水图



东汉学者张衡为人熟知，多是因为他在科学史的地位，其实，他在文学史中也有一席之地。他的一首《四愁诗》，被视为早期文人七言诗的代表作，文字明净隽永，一唱三叹。虽然本心在于“时天下渐弊，郁郁不得志”，不出“屈原以美人为君子，以珍宝为仁义，以水深雪穷为小人，思以道术相报，贻于时君，而惧谤邪不得以通”的传统框架，但其情思真挚深婉，构建出巨大的多重阐释空间。

张衡的四方：泰山、桂林、汉阳（天水郡）、雁门。字面上，它们就是四个汉朝的郡，分居东南西北。可以认为，张衡是每个方向挑一个来当代表。但他心目中的西方代表，从东汉前中期的“玉门”直接收缩到天水，确实可能是东汉政权当时“渐弊”的一种表征。傅玄的四方：瀛洲、珠崖、昆山（昆仑山）、朔方。瀛洲和珠崖是海岛，一个神话，一个真实；昆山和朔方是内陆，一个神话，一个真实。水和陆，虚和实，构成更为复杂的错综。这四个地点，以洛阳为参考坐标，全部都比张衡选择的要更向外推扩。这也就是傅玄追求的“大”。

张衡的四方：泰山、桂林、汉阳（天水郡）、雁门。字面上，它们就是四个汉朝的郡，分居东南西北。可以认为，张衡是每个方向挑一个来当代表。但他心目中的西方代表，从东汉前中期的“玉门”直接收缩到天水，确实可能是东汉政权当时“渐弊”的一种表征。傅玄的四方：瀛洲、珠崖、昆山（昆仑山）、朔方。瀛洲和珠崖是海岛，一个神话，一个真实；昆山和朔方是内陆，一个神话，一个真实。水和陆，虚和实，构成更为复杂的错综。这四个地点，以洛阳为参考坐标，全部都比张衡选择的要更向外推扩。这也就是傅玄追求的“大”。

张衡的四方：泰山、桂林、汉阳（天水郡）、雁门。字面上，它们就是四个汉朝的郡，分居东南西北。可以认为，张衡是每个方向挑一个来当代表。但他心目中的西方代表，从东汉前中期的“玉门”直接收缩到天水，确实可能是东汉政权当时“渐弊”的一种表征。傅玄的四方：瀛洲、珠崖、昆山（昆仑山）、朔方。瀛洲和珠崖是海岛，一个神话，一个真实；昆山和朔方是内陆，一个神话，一个真实。水和陆，虚和实，构成更为复杂的错综。这四个地点，以洛阳为参考坐标，全部都比张衡选择的要更向外推扩。这也就是傅玄追求的“大”。

两首传下来的《拟四愁诗》，都是西晋作品。其一来自傅玄，其二来自张载。以此作为切入点，我们既可以窥见西晋文学的一个侧面，也能进一步确认张衡原作“科学家写诗”的高妙。傅玄《拟四愁诗》小序说：“昔张平子作四愁诗，体小而俗，七言类也。聊拟而作之，名曰拟四愁诗。”他对张衡《四愁诗》的个人评价是“体小而俗”，那么什么是他理解的大而不俗呢？为了直观表现，我们可以截两首诗的第一节来作比较。

《四愁诗》第一节：我所思兮在大山，欲往从之梁父艰，侧身东望涕沾翰。美人赠我金错刀，何以报之英琼瑶。路远莫致倚道边，何为怀忧心烦劳。《拟四愁诗》第一节：我所思兮在瀛洲，愿为双鹤戏中流。牵牛织女期在秋，山高水深路无

由，愁予不遑婴厥忧。佳人赠我明月珠，何以要之比目鱼。海广无舟惭劳劬，寄言飞龙天马驹。风起云披飞龙逝，惊波滔天马不厉，何为多念心忧沮。傅玄把单节篇幅拉长，看起来“大”，但第一小节衬进去的铺陈，可说用三句传递了张衡一句的信息量，略显累赘，且文辞不出新，严重制约了作品中的情绪流动。“何以”、“何为”开头的两句，前者设问，后者反问，相似中又有变化。张衡的这一笔，内容上，表达情绪回环，形式上，韵律的强化与叠唱显得自然婉转。而傅玄插入飞龙、天马的宏大叙事，实在把节奏感给破坏掉了，虽不至于别扭，但拖沓是一定的。傅玄对“大”的执着，还表现在四方之极的选择上。

张衡的四方：泰山、桂林、汉阳（天水郡）、雁门。字面上，它们就是四个汉朝的郡，分居东南西北。可以认为，张衡是每个方向挑一个来当代表。但他心目中的西方代表，从东汉前中期的“玉门”直接收缩到天水，确实可能是东汉政权当时“渐弊”的一种表征。傅玄的四方：瀛洲、珠崖、昆山（昆仑山）、朔方。瀛洲和珠崖是海岛，一个神话，一个真实；昆山和朔方是内陆，一个神话，一个真实。水和陆，虚和实，构成更为复杂的错综。这四个地点，以洛阳为参考坐标，全部都比张衡选择的要更向外推扩。这也就是傅玄追求的“大”。

张衡的四方：泰山、桂林、汉阳（天水郡）、雁门。字面上，它们就是四个汉朝的郡，分居东南西北。可以认为，张衡是每个方向挑一个来当代表。但他心目中的西方代表，从东汉前中期的“玉门”直接收缩到天水，确实可能是东汉政权当时“渐弊”的一种表征。傅玄的四方：瀛洲、珠崖、昆山（昆仑山）、朔方。瀛洲和珠崖是海岛，一个神话，一个真实；昆山和朔方是内陆，一个神话，一个真实。水和陆，虚和实，构成更为复杂的错综。这四个地点，以洛阳为参考坐标，全部都比张衡选择的要更向外推扩。这也就是傅玄追求的“大”。

张衡的四方：泰山、桂林、汉阳（天水郡）、雁门。字面上，它们就是四个汉朝的郡，分居东南西北。可以认为，张衡是每个方向挑一个来当代表。但他心目中的西方代表，从东汉前中期的“玉门”直接收缩到天水，确实可能是东汉政权当时“渐弊”的一种表征。傅玄的四方：瀛洲、珠崖、昆山（昆仑山）、朔方。瀛洲和珠崖是海岛，一个神话，一个真实；昆山和朔方是内陆，一个神话，一个真实。水和陆，虚和实，构成更为复杂的错综。这四个地点，以洛阳为参考坐标，全部都比张衡选择的要更向外推扩。这也就是傅玄追求的“大”。